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周作人 与周门弟子

高恒文 著

周作人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而周作人与其弟子的文学思想、创作和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成就；周作人的人生道路，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现象。本书遂章论述了周作人与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元、江绍原和



任访秋等人在文学思想、创

作和学术研究上的影响关系，并且同时也论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趣味和选择的影响关系；最后几章直接论述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七七」事变之后和1949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创作和人生抉择，是对前文涉及的问题的集中讨论。

大象出版社

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周作人 与周门弟子

高恒文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与周门弟子 / 高恒文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4. 6

(20 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

ISBN 978-7-5347-7356-3

I. ①周… II. ①高…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
—人物研究 ②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3992 号



周作人与周门弟子
高恒文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划组稿 张前进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马 宁 张迎娟 安德华 牛志远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6 电话 0371-65642565

总 序

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 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

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①。“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

^① 转引自汝信:《现代外国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①,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了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立

① 《康有为年谱》,《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②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场,使他成为现代中国重“问题”不重“主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不少的追随者,以傅斯年、顾颉刚等最为著名。在学术上,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针,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引、示范作用。至于周氏兄弟,则分别是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和巨石重镇。鲁迅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去世时获得了中国“民族魂”的盛誉,围绕他的鲁门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在现代文学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色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鲁迅不同的选择,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这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向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靠拢,他其后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褪掉“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走向平和冲淡,苦涩闲适。在他身边,围绕着俞平伯、废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带有闲适、冲淡、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周作人又是中国民俗学、古希腊文学、明清文学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继承并发展其民俗学研究的弟子有江绍原,继承其明清文学研究的则有沈启无等。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是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上急剧“西进东退”的时代,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一生为故国招魂”,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国人必对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对其时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和批驳。他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是否在现代还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大时代问题,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的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等也都成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

学者。

古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选择老师、朋友时，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师生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私学传统中在师生双向选择下形成的师生关系，更是一种情同父子的关系，选择什么人为师，也就意味着对为师者的志向、人格、学问的整体性的尊崇和认同，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对老师有一种孺慕之情，而为师者对学生担负的是与父母一样甚至大于父母的责任，所以这种私学传统中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一种犹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的文化群落。每个师徒群体自有其特质，成员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价值观比较相近，在思想行为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成员对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师徒群体的存在除有利于他们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之外，还具有满足其群体成员的多种需要的功能，如使群体成员满足亲和与认同的需要，满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心和力量感。学生为自己所属的师徒群体感到自豪，为师者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提携扶持，不遗余力。像胡适的弟子罗尔纲专门写了一本书《师门辱教记》，十分动情地回忆了在胡适门下五年得到的言传身教。胡适对弟子的这本小书也十分看重，曾说此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的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大。直到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还自费印行了这个小册子，分赠亲朋。再如萧军直到晚年还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我是鲁迅的学生！”当别人问他20世纪30年代文坛宗派有哪些时，他的回答是：“别人有没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但是我萧军有宗派——‘鲁宗鲁派’！”^①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知识群体中的师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亲密、融洽的，但师生之间也会出现龃龉，像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

^① 秋石编著：《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勋复辟”立场上截然对立、公开辩难,梁启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师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使得一向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大为光火,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并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当然,两人多年的师生关系、患难之情并不会就此割舍,事过境迁后,仍会重修旧好,做学生的还是要向老师表示歉意和依顺。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为不满于老师章太炎赞成“讨赤”,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不再认章太炎先生为师。这虽然从师生感情上来看不无遗憾之处,但也可从中看到现代个人独立意识对于传统单向服从性的师生关系的突破。与此相应的是为师者将学生革出师门的事也时有发生,像鲁迅之于高长虹、周作人之于沈启无等,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提示我们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发表作品的报纸、杂志多带有同人的性质,社会文化资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所以被革出师门的沈启无等于被驱逐出了文教界,一时间只能靠变卖东西为生;高长虹则因为受了鲁迅的迎头痛击,长期被视为文坛异类,声名狼藉。总之,以这种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为单位,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现代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对我们深入了解近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雅明曾经说过,“所有文明的文献都同时就是野蛮的文献”^①,也就是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判断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标准,时间并不能将“野蛮”阻断于过去而在未来造出一个至善无恶的“美丽新世界”。章太炎早在清末就发表了他的《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

^① 转引自马丁·杰:《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进化之用无所取。”^①故而至善无恶之境无从达致。历史乐观主义的虚妄在于其以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信仰放过了对内在于人性深处的“恶”的警觉;以“新旧之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取代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历史乐观主义所持有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及源于进化论的人性可臻无限进步论的信念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导叙事。对这种现代主导叙事的重新审视和反省也是我们今天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必要环节。我们力图走出那种特定的、单一的、目的性过强的、缺乏距离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一种更为客观、多元、审慎的态度来重审、讲述中国的“现代百年”,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理解。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入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①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民报》第七号,1906年9月。

目 录

绪 言 京派中的京派

——一个文学史的命题,一种阐释周作人的方式/001

第一章 “出家”还是“在家”?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人生选择/029

第二章 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083

第三章 《窗》:“人生之艺术化”与“梦的真实与美”

——废名与周作人的人生与艺术的深刻思想共鸣/111

第四章 阐释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诗”

——周作人和废名对“六朝文章”“晚唐诗”的特殊情怀/139

第五章 “梦想的幻境”和“文章之美”

——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阐释/193

第六章 “怀废名”与叹知堂

——周作人与废名 1937 年之后的师生情谊之分析/231

第七章 谢本师：“你也须要安静”

——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的历史考察/269

第八章 书信中的故事

——周作人与江绍原往来书札笺疏/307

第九章 一种别有意味的对话关系

——任访秋古典文学研究与周作人影响之关系/351

第十章 哪里来？何处去？

——周作人的“五四”文学观及其与俞平伯、废名之关系/381

第十一章 “言志”的苦心与文心

——周作人 1937 年至 1939 年北平“苦住”期间创作之
分析/411

第十二章 话里话外：1939 年的周作人言论解读/439

后记/470

绪言

京派中的京派

——一个文学史的命题，一种阐释周作人的方式

作为本书开篇的“绪言”，我想以释题的方式来说明本书的“名”与“实”，概述全书的题旨和内容，以及写作设计。

一、京派中的京派

本书原名拟作“京派中的京派——周作人与他的弟子的思想和创作”，后按出版社对丛书书名的统一体例改为今名。当然，若从更清楚地表明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内容来看，笔者以为，原来的书名更合适一些。

正如十多年前我在《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那本京派史论的书中所说，京派是由分化后的“语丝”派和“新月”派汇聚、融合而来的，而30年代初海外留学归来的朱光潜等人和北平诸高校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加入，则是扩大并加强了这个流派的实力和声势^[1]。据此而论，由“语丝”派分化而成的以周作人为中心的《骆驼草》杂志诸人，其实是京派形成之前的最初的“前京派”，所以沈从文重回北平之前在《论冯文炳》一文中说周作人是

北方文坛的“盟主”，并批评周作人及其影响之下的弟子俞平伯、废名^[2]，则是全然视之为一个文学团体，也即所谓的文学流派。并且，虽然《骆驼草》仅仅是在1930年昙花一现，而叶公超主编的后期《新月》1934年才停刊，并旋即创刊《学文》，但后期“新月”派却并未取代或收编“骆驼草”诸人，反倒是叶公超、沈从文等后期“新月”派主要人物主动地趋拜、输诚于周作人。叶公超重回北平后成为“苦雨斋”的座上常客，甚至在北平沦陷之后还回到北平殷切劝说周作人南下^[3]。沈从文对周作人的态度变化，最具意味。1933年夏天重回北平的沈从文，一反他此前在《论冯文炳》一文中的批评态度，主动拜访“苦雨斋”，为自己主编的《大公报》之“文艺”副刊约稿^[4]。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说：

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5]

而据巴金回忆，20世纪30年代中期，沈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周（按，周作人）”，并且在看到巴金的讽刺周作人等人“沉落”的小说之后，马上致信质问巴金，认为巴金并不理解周作人^[6]。其实巴金的讽刺，和沈从文此前在《论冯文炳》中批评周作人等人“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将“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和“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视为因果关系，虽然主要是批评艺术的“趣味”，实则

隐含了巴金所讽刺的人生的“沉落”，不同之处在于批评与讽刺之别，在于思想的出发点不同。所以，从京派的基本的队伍之最初构成来看，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诚可谓京派中的京派。

再从30年代初海外留学归来的朱光潜等人和北平诸高校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在京派中的核心地位。

朱光潜早在回国之前就发表过对《雨天的书》的书评，高度称赞周作人的散文^[7]。他回国之后著文称赏陶渊明的“静穆”，受到鲁迅的严厉批评^[8]，原因就在于不仅周作人30年代一再称颂陶渊明，而且废名在《知堂先生》一文中将周作人比拟成陶渊明一样的“渐近自然”的“南朝人物”^[9]，废名还在《关于派别》一文中批评林语堂“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派”，认为“知堂先生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求之。因此我想到陶渊明”^[10]。甚至在周作人“下水”附逆之前，大后方作家批评、讨伐周作人竟然出席日伪的活动，朱光潜仍然发表文章为周作人辩解，呼吁慎重对待^[11]。——周作人之“下水”，首先伤害深重的就是朱光潜、叶公超这些尊敬、信任他的朋友。

朱光潜对废名称赏不已。他著文高度评价废名的小说《桥》：“《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这几乎道尽了《桥》的最主要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并且，朱光潜也几乎是最早指出废名小说与“晚唐诗”的关系，认为“《桥》的文字技巧似得力于李义山诗”，进而指出《桥》“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12]。朱光潜甚至对废名为数极少的诗，也很称赏：

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

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13]

朱光潜当然是深为“了解”废名其人的,他们之间不仅有极深的交往,而且朱光潜十分欣赏废名的艺术见解。他在1936年公开发表的《王静安的〈浣溪沙〉》一文中说:

友人废名君有一次来闲谈,提起六朝文学,他告诉我说:“别看六朝人的词藻那样富丽,他们的内心实有一种深刻的苦痛。”这句话使我非常心折。六朝人的词藻富丽,谁都知道,他们的内心苦痛,稍用心体察的人们也可以见出。废名君的灵心妙悟在把他们的词藻富丽和内心苦痛联在一起说,仿佛见出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

此“闲谈”犹魏晋之“清谈”也;这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之“言语”卷的文字。与乃师知堂素有同好,废名亦对六朝文章有很深刻的独特领悟,而朱光潜亦固是“解人”,所以文章紧接着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我当时没有问废名君,依他看,这种关系究竟如何。依我揣想,尼采对于古希腊人所说的“由形相得解脱”也许可以应用到六朝人。词藻富丽是他们拿来掩饰或回避内心苦痛的,他们愈掩饰,他们的苦痛更显得深沉。看六朝人的作品,首先要明白这一点,如果只看到词藻富丽,那就只看到空头架子了。写到这里,我想起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批评纳兰容若的话:“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之所以为重光后身也。”“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是六朝人的妙处,是李后主和纳兰容若的妙处,也是这首词(按,王国维《浣溪沙》“天末